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6.00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毛泽东农村调查 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熊辉,赵辉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大革命时期实地考察了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深入调查了边界根据地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全面和深入了解了农民阶级状况。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全面分析了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传统政治理想和传统文化特征,肯定了农民运动的正当性、农民的革命精神、农民追求公平的政治理想,批判了农民绝对平均的思想和封建宗法迷信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革命精神和政治理想进行正确引导,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政治理想和文化价值得以相融相通、产生共鸣,从而通过调查研究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6-0008-09

一 毛泽东通过对农民的悲惨生活和阶级压迫的调查研究,肯定了农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进行正确引导,使农民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坚定的实践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源源不断的动力^①

第一,毛泽东通过调查,深入了解农民遭受残酷剥削的经济生活现状,了解农民迫切改变现状和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要求。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早年就对农民生活状况有所了解。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认识分析农民问题,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思考造成农民悲惨命运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即将传入中国之前的1917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毛泽东就与好友萧子升以“游学”的方式进行农民社会调查^②,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研究中了解到农村

中的大多数都是遭受极大困苦的佃农,发现了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尽管此时的青年毛泽东还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但这次难忘的“游学”经历却使毛泽东对农村中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即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有了深切了解,为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快接受这一理念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实践基础。1918年8月,毛泽东组织湖南学子赴法勤工俭学,在北京停留之时,到北京附近的农村了解北方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北方的农民同南方的农民一样生活悲惨。1925年农历正月十四,毛泽东回到韶山,看见和听说了家乡官僚贪赃枉法、地主豪绅横行霸道的事实。家乡农民向他诉说农民生活越来越艰难,表达了强烈的革命要求:“润之先生,

收稿日期:2019-07-1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BDJ023)

作者简介:熊辉(1971—),男,湖南常德人,博导,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①学术界关于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的时间划定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种划分:第一种划分是把“早期”限定到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第二种划分是把“早期”限定到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第三种划分则把“早期”从建党延伸到土地革命时期。本文所涉及的“早期”按照第三种划分,即指党的创立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调查研究 and 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听说你在长沙,在安源,带领工人和反动派作对,回回都搞赢了。这次回韶山,能不能带领我们也闹起来?”^①毛泽东对乡亲们的话与受压迫的客观现实进行了分析,得知农民的革命要求集中体现为推翻土豪劣绅大地主、封建官僚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此来实现人身自由和获得经济利益。1925年12月毛泽东结合以前的农村调查研究,“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②,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生活现状和革命性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农民因经济状况有差异,其革命性也有区别,其中贫农的革命性最强烈^③,毛泽东同时对农村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做了分析,认为“此种人在乡间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④。他还肯定了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半自耕农和贫农的革命要求,尤其是贫农“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⑤,他们和雇农一起,是农民运动的中坚。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湘潭西乡对农民特别是佃农生活状况作了一系列深入广泛的调查,调查的成果后来在他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做了总结:“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⑥1927年1月4日起至2月5日共32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在湖南实地进行农村考察,对农民生活状况做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调查,“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⑦的“赤贫”和“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⑧的“次贫”人数最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最坚定,“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⑨。1927年7月20日党中央和中

央农民部发出的《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也指出:“现在全国农民,整个的在新旧军阀之下喘吁地活着,十几年新旧军阀战争的负担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最大部分架在贫苦农民身上。”^⑩这与毛泽东在农村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一致。正因为农民受到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而农民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要求最为迫切,毛泽东因此判断:“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埋入坟墓。”^⑪在旧中国,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毛泽东在调查湖南农村农民运动的过程中,亲眼看见了农民强烈的革命热情,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看到大革命期间的湖南农民参加庆祝大会的情景:“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⑫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将会源源不断加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队伍。

第二,毛泽东早期通过农村的社会调查,考察和论证了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精神的合理性、正当性和重要性。其一,毛泽东通过多次调查研究后认为,农民的革命精神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农民运动具有合理性、正当性。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自幼就对农民的悲惨命运十分了解,再加上成年后经过广泛的农村社会调查,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农民运动是农民同封建贵族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对封建旧体制、旧观念的冲击和破坏,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巨轮。毛泽东肯定了从秦末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到清末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反抗压迫的革命精神和对历史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

①陶永祥:《毛泽东与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⑥《毛泽东农村社会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⑩《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⑫《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大革命时期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不一,出现了批评责难农民运动,甚至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②。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③,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几十天时间里亲身调查和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的农村后,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毛泽东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农民运动不是国民党污蔑的所谓“痞子运动”^④,完全不是一些“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所讲的“糟得很”而是“好得很”^⑤,对农民反抗封建压迫和反帝国主义运动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和赞扬:“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⑥农民运动完全是正当的、合理的,那些把农民运动称之为“过分”举动和“痞子运动”的荒谬之言纯属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等压迫阶级的污蔑。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驳斥了党内的责难,针对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过分”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运动所谓“过分”问题,“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况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⑦。因此,毛泽东调查研究后认为,农民所谓的“‘过分’的举动”在大革命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⑧。中国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受剥削最重,生活最为悲惨,毛泽东通过农村社会调查,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革命精神的合理性、正当性。其二,毛泽东通过亲自参加农村调查,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农民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落后的农业国度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得到农民大众拥护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一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里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⑨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较之俄国革命又有所不同,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毕竟人数太少,没有农民这个庞大群体的拥护和其内生的磅礴力量的支持,中国革命无法取得胜利。这一点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去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⑩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⑪,毛泽东通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三十多天后得出结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⑫并且他断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⑬当时,党内外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充分重视农民的力量、如此肯定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调查毛泽东认为:“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⑭之后1927年秋,经过秋收起义的失败,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毅然决然带领起义部队深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⑤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⑩《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8—339页。

⑪《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注释。

⑫《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⑬《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⑭《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入井冈山,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以农民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别于俄国模式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实质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阶段新篇章。

第三,毛泽东通过农村的社会调查,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目标、历史任务与中国农民革命要求的共鸣之处,并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把农民运动提升到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水平。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目标是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剥削。毛泽东通过农村调查得出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集中体现为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可以看出,农民的革命要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历史任务具有一致性,进而能够产生共鸣,那么如何使二者始终保持一致呢?长期以来旧中国农民在封建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与思想禁锢下,无法摆脱小农思想和皇权思想的束缚,他们不能如无产阶级那样具有高度彻底的、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革命自觉,“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地主和富农——笔者注)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①。历史已经证明:绝大多数农民只是简单地认为只要推翻某一君主的封建统治就能实现其政治经济利益,却没有看到封建思想和制度才是压迫根源,从而导致他们推翻的并不是旧制度、旧思想和某一阶级,而是某一君王或君王家族的统治,最后建立的还是旧制度旧思想统治的新的王权政治。而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宗法阶级,消灭封建势力赖以生存的思想、制度和国家机器,消灭利用它们的国内统治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侵略者,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建立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权。为了准确了解和把握农民运动的革命目标与无产阶级革命目标的差异性和一致性,毛泽东在湖南等农村深入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后认为,一方面,“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②。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应当得

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农民运动也有缺点,无产阶级政党要正确引导积蕴于农民身上的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水平提升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和目标上来。对于受封建思想束缚的旧中国农民来说,从受传统文化思想束缚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思想上的脱胎换骨。毛泽东认为,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引导,逐步改变农民传统思想中消极落后的一面,使农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和革命的动力。在井冈山艰苦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③为此,毛泽东通过农家串门、开茶话会与办夜校、“雪耻会”、农讲所、农会等方式和手段向农民分析阶级压迫现状、宣传革命道理、讲解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提高农民的革命觉悟,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介绍和灌输给广大农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调查发现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的政治宣传卓有成效:“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起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④此外,毛泽东常常用鲜活的案例和浅显的道理给农民讲解阶级构成、阶级关系,使农民不仅认清了农村革命的对象,还认清了导致农民悲惨生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受他所属的阶级所支配”“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⑤身上蕴藏着巨大反抗精神的农民一旦接受了先进思想,一旦明白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目标同自身的革命目标相契合,农民身上所激发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农民阶级也就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⑤王首道:《革命的摇篮——回忆毛主席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青年报》1961年6月29日。

革命理论的源源不断的阶级力量^①。

二 毛泽东对反映农民传统均平政治理想进行调查研究的肯定,肯定了农民追求公平的理想,批判了农民政治理想方案中的绝对平均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目标与农民政治理想相契合,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历史任务

第一,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研究中对传统的农民政治理想中追求绝对平均的错误政治思想进行了批判。平均主义是深刻影响旧中国农民阶级思想文化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已经深入农民的骨髓,成为农民处事的一种行为标准。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都提出了反映农民自身愿望,带有严重平均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农业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与中国农民阶级相结合必须解决农民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毛泽东在领导农民革命的实践和农村调查中敏锐地发现了农民的绝对平均政治思想给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的负面作用,并结合革命战争的实践对其进行了批评。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会议,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其中详细列举和批评了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红军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问题,如政治上的平均主义表现为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要求绝对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②,红军中的非组织观点,也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③。再如,在红军中存在的经济生活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也十分严重,毛泽东详细列举和批评了这种现象,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④。红军

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实质是长期以来中国小农经济在农民政治理想中的反映。“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⑤。毛泽东认为,农民的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⑥。在农村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之所以批评红军中的平均主义,其目的就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在农民中传播作好思想准备,使农民接受正确的政治理想并为之奋斗。

第二,在早期的革命实践和社会调查中毛泽东认识到,农民传统均平政治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初级的政治目标相契合。在革命艰苦环境中既要肯定农民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追求公平和平等的合理期望,又不能简单地囿于农民文化思想传统中的均平政治理想,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对农民的政治理想进行升华。自古以来中国无数次的农民起义都是为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平均,长期以来农民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均平思想是农民的一种理想政治心理定式和思想认同,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就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农民的心理诉求,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农民接受成为可能。列宁指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是合理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的、奴隶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⑦,但“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反动的空想的”^⑧。在农村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平等思想的基本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要正视、尊重和帮助实现农民追求公平的合理期望。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以城市为主被迫走向以农村为主要阵地,因而,马克思主义如何与处在中

①张明:《新时代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三重维度》,《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⑦《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⑧《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页。

国相对贫困偏远地区的农民阶级更好地结合起来,成为共产党人必须完成的重大课题。农民追求公平和平等的愿望是与农民追求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愿望紧密联系的。因此,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就高度重视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的土地并按照一定规则将其分配给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愿望得以实现,促进农民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来。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实现农民以分配土地为中心的均平理想,开展大量实地调查,如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不断完善土地政策,尽可能实现农民千百年来的均平理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的思想,分析和吸收农民“均平”观念的合理因素,把农民均平思想看作是农民合理的追求,要求红军的物质分配做到大体上的平均。在土地革命的艰苦斗争中,为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毛泽东领导红军实施“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满足农民自古以来就追求的“均田地”的愿望。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领导苏维埃革命政权充分考虑农民传统均平理想和土地分配的实际情况,以《土地法》的法律形式规定“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①。1927年4月,毛泽东等人负责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七项决议草案》指出:“解决土地问题,‘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分配,以人口为标准,顾及年龄”“没收土豪劣绅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②。1930年毛泽东考察寻乌的土地斗争,他在《寻乌调查》里说:“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③在这篇土地分配调查文献中,毛泽东所讲的“平田”政策就是根据长期以来存在农民思想文化中的“均平”思想而制定的。1931年2月27日,毛泽东还根据中央精神和自身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土地分

配中的问题,提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政策,最终形成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④。无论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还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都是为了实现农民传统政治理想中的均平思想。毛泽东所提倡的“以人口为标准”的“平均地权”的思想充分体现出农民追求的“均平”政治思想。但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的平均地权是建立在一定条件下的相对平均而不是无差别、一刀切的绝对平均。此外,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队伍中,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环境下,尽管毛泽东多次对红军中存在的绝对平均思想进行过批评:“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的,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⑤但同时他也强调:“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⑥这种军事平均主义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极大地鼓舞了以农民为主的红军的革命精神,“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⑦。正因为土地革命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根据地共产党人制定了符合农民思想政治追求和传统心理的土地政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吸引了广大农民源源不断加入,也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历史任务。

三 毛泽东对农民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调查研究,透彻分析和批判了农民封建宗法家族关系和迷信心理,采取了既承认又积极引导、既有马克思主义坚定原则又有灵活性的态度,使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思想实现融合,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思想阵地

第一,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剖析和批判了农

①《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②高菊村:《青年毛泽东(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236页。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民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宗法家族思想,在实践上采取既承认又积极引导的方式,逐渐消除和克服农民传统宗法家族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民中的传播开辟了阵地。旧中国农村长期形成的宗法观念与血缘家族关系控制和影响着农民的思想和心理,封建统治阶级以等级制度、宗法家庭关系、伦理纲常等将对农民的阶级压迫变成掩盖事实真相的“天命使然”的自然状态。长期以来,宗法家族关系是旧中国小农经济社会中农民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和准则。毛泽东在湖南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和农村状况后明确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①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发现,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复杂性掩盖、中和了阶级对立,绝大多数农民不清楚自己受苦受难的真正根源,其政治意识中阶级意识淡薄,但宗法观念、地方主义观念强烈。由于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都是在偏远农村,农民的社会关系都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处在农村的党组织的成员几乎都是农民,他们具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在这样的农村环境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行党的建设极为困难,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调查发现“‘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②。由于根据地边界各县的党,“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庭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③。宗法关系和家族势力像张无形的网,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空间里,“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④。根据地党组织与家族势力缠绕在一起,党组织关系中存在的宗族裙带关系,无疑严重影响到了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特别是土地

政策的落实,导致马克思主义在农民群体中的传播异常困难,宗法家族问题成为党在农村领导土地革命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如何让农民在思想上摒弃长期存在的宗法家族关系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此,毛泽东通过在湖南几个县的实地考察,找到了答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指出,就是要成立各级农会,把农民“组织起来”^⑤,农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完成了打倒封建宗法的土豪劣绅这一革命任务。随着中国共产党从主要在城市领导无产阶级转到在农村主要领导农民阶级进行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建立了新式群众组织,以封建宗法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民间秘密团体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⑥。这种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组织不同于旧式的以宗法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民间组织,而是依据阶级地位划分形成的群众组织,农民在党领导的农会组织中提高了阶级觉悟,破除了封建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欣然发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分,分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⑦进而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一旦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就会极大冲击和破坏农村封建地主的统治秩序^⑧,捆绑在农民身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等绳索被解除,农民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了”^⑨。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迅速荡涤了中国农村长期以来沉积的封建思想和势力,而且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的新文化也逐渐被农民认识和接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源源不断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第二,毛泽东通过农村社会调查,发现农村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封建迷信与神权思想与马克思主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注解17条。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义思想相悖,对此,毛泽东既采取坚定马克思主义原则对农民迷信与神权思想进行批判和破除,但在实践中对农民传统迷信文化表现出灵活务实的态度,没有把无神论作为农民入党的必要条件,使马克思主义能够被农民所接受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消除迷信和神权思想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民中的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一,毛泽东分析和批评了农民中存在的封建迷信。通过早年广泛的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认为封建迷信是中国农民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普遍存在着“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①的迷信心理。封建迷信是正如“农民运动的王”澎湃所说的那样,是农民“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观念”,“关于贫穷种种痛苦压迫的问题,他们大都说:‘这是天命使然’,并且‘没有得到好风水’”^②。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工具,使农民生活异常艰苦、利益无法实现,只好求助于“他物”即神灵和祖先的“赐福”和“保佑”,它们使“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③。那么如何破除深深根植于中国农村的封建迷信神权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为农民大众欣然接受?毛泽东认为不仅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斗争,还要深入进行经济斗争。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指出:“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④经过广泛的农村调查和缜密的思考,毛泽东认为农民不可能依靠“用宗教迷信为团聚成员的工具”的“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⑤的民间秘密团体取得革命胜利和得到出路。农民只有在先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下,将农民传统的革命性升华为先进的革命精神,将“原版”的农民战争升华为“再版的农民战争”^⑥才能够实现革命愿望。其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和教育农民

抛弃神权与迷信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思想阵地。早期的农村调查特别是对湖南等地进行实地农民运动考察后,毛泽东肯定了农民运动中农民破坏封建迷信取得的成果,“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⑦。不过,他认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农民一时难以彻底放弃神权和迷信思想。因此,毛泽东在坚持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时并没有强迫农民立即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想,正如他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后说的:“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为此,毛泽东还借用孟子的名言“引而不发,跃如也”来说明这一道理^⑧。在这里,毛泽东的意思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⑨。毛泽东认为,要破除农民神权思想和迷信心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思想阵地,就必须在农民中间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⑩毛泽东用简单的事实启发了农民思想觉悟,用不可辩驳的事实破除了农民的神权思想和迷信心理。农民的迷信心理是在历史长河中由于封建统治和科学技术不发达等原因形成的思想认识问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②《澎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192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页。

题,因此,党在领导农民革命过程中要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教育农民,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逐步消除农民的神权思想和迷信心理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思想理论。其三,毛泽东基于对农民文化传统的透彻了解,吸收农民入党时没有把无神论作为必要条件,而是从农民传统思想的实际出发,在吸收农民入党的问题上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原则又有灵活性的务实态度,最大范围地把农民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党的四大后,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人人数不多的湖南党组织

发展十分迅速,入党的党员很大部分是农民,这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和务实的工作有关。当时的中央对此高度认可,“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在这样大的环境变动中,能把一切民众运动均集中在我党指导之下,能使党的组织在突飞的发展中不落于空浮,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亦稳当周到”^①。早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农民神权思想和迷信心理的改造、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及对农民入党采取的务实态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思想阵地。

Mao Zedong's Rur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in Early Stage of the Neo-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inization of Marxism

XIONG Hui & ZHAO Hu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neo-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when exploring the road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ad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s of the peasants movement in Hunan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y also made profound investigations of the peasant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had a comprehensive as well as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 of the peasant class in the border revolutionary base. They used the Marxist standpoints and view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miserable life of peasants by affirm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peasants movement, their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their political ideal of pursuing the justice. They criticized the peasants' absolute average ideology and feudal patriarchal superstition psychology. In addition, they correctly guided the peasants'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political ideal by using Marxism, so that the social ideal of Marxism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revolutionary requirements, political ide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Chinese peasants. Both of them resonated with each other, thus realiz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y means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Key words: Mao Zedong; early period; rur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